

我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的作家
包揽国内儿童文学重要奖项的作家
全部作品首次完整收录

孙幼军文集

第十五卷

给老师留作业的学生
我的不周山

.....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孙幼军

第十卷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

我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的作家
包揽国内儿童文学重要奖项的作家
全部作品首次完整收录

孙幼军文集

第十五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· 沈阳 ·

© 孙幼军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孙幼军文集. 第十五卷 / 孙幼军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5. 1

ISBN 978-7-5313-4702-6

I. ①孙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孙幼军—文集②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3637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: 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58mm×229mm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217 千字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韩忠良 单瑛琪 王晓娣

责任校对: 张 斌

封面设计: 冯少玲

印制统筹: 刘 成

ISBN 978-7-5313-4702-6

定价: 22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24-24211683

大童话家的精彩散文

樊发稼

顷接好友孙幼军“密告”，他的两部散文书稿《洋教头手记》和《桃园的大鸡和小鸡》已为春风文艺出版社接受，即将联袂推出；幼军同时将两部书稿的电子文本悄悄发给了我。

我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和文学批评工作者，真正是感动之至、高兴之至！

感动的是，春风文艺出版社慧眼识珠，不因孙氏散文为幼军自己的童话灿烂光芒遮蔽而有所轻视乃至忽略。

高兴的是，我一直期盼着众多散登于诸报刊以及未发表过的各类精彩幼军散文（包括随笔）正式结集出版，以飨广大读者。我这个愿望终于要实现了！

其实，早在十多年前，幼军即以一本《怪老头儿随想录》在散文王国取得了响当当的“身份证”。那本散文集曾荣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（1998—2000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记得享有“京城四大名编之一”美誉的《人民文学》原副主编、著名文学评论家崔道怡先生在仔细审读幼军这部散文集后，在评委会上满怀感佩地说：“到底姜是老的辣呀！”

散文是文学诸样式之一种，又是一切文学的基础。

散文内容绝不可虚设造假。

散文最见作者真思想真性情，也最见作者文字语言真功夫。

幼军散文无论追忆童年、诉说经历，还是怀人记感、叙述亲情友情，唯一字概之：真。真人，真事，真思想，真感受，真情愫。唯其真实，读来倍感亲切。至少绝无被欺骗、被愚弄的感觉。

幼军自小明敏过人，家学笃厚，启蒙即受中国悠久传统文化思想美德浓郁熏陶；长大刻苦问学，博闻强记，经史子集、古今中外，博览群书。他出生于民族多难时期，小小年纪，即随父母举家四处迁徙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，深察底层民间疾苦；他当过运动员（少时曾是冰上运动省代表队的优秀选手），扛过枪，做过工，种过地；大学毕业后长期从教，业余主要从事童话创作。他精通俄、日两种文字，译过多部外国文学名著，是著名作家又是卓有成就的翻译家。丰富的阅历、广博的知识、崇高的良知，加上自身矢志不移、不懈求索、刻苦创造，使他成为一名业绩卓越的文学家、特别是广受国人喜爱和推崇的童话家，声名远播海内外。

阅人阅事阅世如此深广，又有较高的文学造诣，幼军一旦写起散文来，自是出手不凡！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长期的写作实践，使幼军修炼出一身驾驭文字的绝妙功夫。我这里不妨来个大“揭秘”：幼军从小学四年级始，即写日记，迄今绵延七十多年，不论在何种艰窘情况下，从未有过中辍。他写日记，或简或繁，总字数已积有四五百万之多！这是一个大奇迹！须知“日记”就是散文之一种啊。我看过他尘封半个多世纪、留下种种生活和时代印痕的日记原文，轻轻抚拂、深情诵读之际，我感佩之至、激动万分！一个人从少不更事的童年、少年，到青年、中年、壮年、老年，漫漫岁月如云变幻，而日记写作者之执着、之坚毅

则一以贯之！仅凭这点可断：这位日记作者、这样意志刚韧的“男人”，必成大器。

——我说这些，与谈幼军散文不悖。尚请读者细品之、深思之。

幼军在文坛，是位鼎鼎有名的大作家、大童话家，他在生活中，则是一个毫无架子、极为随和的普通人。他心性善良，有一颗弥足珍贵的悲悯之心和大爱之心。他为人坦白诚恳、重朋友情谊、敬畏前辈、乐于助人，同时刚直不阿、满身正气、疾恶如仇。在小孩子眼里，他是和蔼可亲的爷爷、特有趣的“怪老头儿”；在莘莘学子面前，他是一丝不苟、循循善诱、特别敬业的老师；在儿女面前，他是慈爱的、朋友一样平等的好父亲；文学同行们都愿意和他倾心畅谈，交为知心好友——这一切，在他的散文里都有直接间接的反映。

作为童话名家，幼军擅长编织动人故事。他的散文多为叙事体，不论何种题材内容，往往亦有充满生活实感的故事、情节，乃至鲜活怡人的细节穿插其间，每令读者读来不禁抚卷莞尔、趣味盎然。

幼军散文的文字语言，朴实、圆润、流畅，自然有如山间晶莹溪水之潺潺流淌。他不尚辞藻，却给人以美好辞章和文采的惬意享受。说幼军的文学语言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是绝不为过的。

幼军的散文是大童话家的精彩散文，是美文，是中国新时期、新世纪散文宝库中的别样明珠，是广大成人和青少年丰富精神生活、接受高尚思想和美感熏陶、甚至学习作文和创作难得的文学读本。

2010年5月3日于北京南方庄

（作者系诗人、文学评论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、原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。）

目 录

001 / 洋教头手记

231 / 我和“十不全”

洋教头手记

YANGJIAOTOU SHOUJI

第一辑 洋教头手记

走马上任

——“洋教头”手记之一

“洋教头”本来是对在中国教书的外国人的戏称。我在外国驻华大使馆教书的时候，我的那些中国朋友也叫我“洋教头”。我想，倒也通。一个是，我是教洋人的教头；再一个是，对于那些“老外”来说，我也是洋人，一个东方洋人。

1972年年底，我从江西一个山沟沟里调回北京，结束了三年零两个月的“五七战士”生活。我原来工作的W学院在“文革”中被撤销，我是沾了妻子的光才回来的，她是位医生。还好，赋闲了两个月，我也有了工作。

我兴奋异常。你想想啊，“停课闹革命”，一闹就是七年，我终于可以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了！此外，教的学生是外国驻华大使馆和新闻、商务机构的外国人，又增添了几分神秘感。我报到后，外交人员服务局还发给我150元的“置装费”，也是从未有过的事。

那笔钱几乎是我三个月的工资。看来，我这历来不修边幅的穷小子也要梳洗打扮一番了！

可是，我很快就陷入了惶恐不安之中。

汉语教研室的负责人是一位戴着副近视镜，两腮刮得铁青的白胖子。他找我谈话，询问两句我以前从事汉语教学的经历后，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教研室，接着就说：“有人以为闯过了大门警卫那一道关进入大使馆，就万事大吉了，其实才不是那么回事呢！一个家伙藏在大使馆的汽车里混进去了，在使馆里头藏了半个多月——当然不能进去抓他，那一小块地方算人家的领土。可是他也别想溜出咱们的国境，到底在海关抓住他了。那是叛国罪！”

接下来，他又举了好几个类似的例子，讲得我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”。

谈话结束，时间尚早。我想既然我已报到，就算正式上班了，有事没事，也不该回家，决定到教研室翻翻书报消磨时光。

教研室坐着一个人，正在看报，见我进去，立刻跟我打招呼，说他也是等着教研室安排课程的。那人同我年龄相仿，头发蓬乱，戴着副近视镜，衣着也同我一样随随便便。所有这些使我立即将他引为同类，我们朋友般交谈起来。

原来，他到教研室虽是第一天，却早在局里工作。我刚好可以向他了解一些情况。我问他：“是不是教研室有人借工作之便，钻进使馆里就不出来了？”

他睁圆双眼，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：“不出来干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找机会逃到国外去呀！”

他摇摇头说：“没听说过教员里有叛逃的……是如来佛跟你讲的吧？”

我乐了。原来那位胖子负责人有这样一个雅号。他一张团团脸，垂着两扇大耳朵，还真有点儿像如来佛。

我说：“那可是领导哇，怎么会乱讲！要么是教员成批地叛逃，

要么是我这人让人家一看，就是个想弄架‘三叉戟’往温都尔汗跑的家伙。”

他哈哈大笑：“他那人就那德行，你别理他！”

但他那股高兴劲儿很快就烟消云散，换上一副愁容：“可你也别当到大使馆里当教员是什么美差。我反正不想干！”

在当时，害怕跟外国人接触是一种普遍的心态。不过，这里讲的是“当教员”，我很想知道他忧虑些什么。

他说：“决定把我分配到这儿教书之前，他们让我在办公室帮助清理运动中的材料。那里头有一批揭发信，其中一份，是在大使馆当服务员的中国职工写的。他‘揭发’说，他去送茶，那个教员正跟他的外交官学生‘嘀嘀咕咕’，一见他进去，突然停住不说了，‘情况极不正常’。我的老天！要是给你来这么一份‘揭发’，你说得清？别的事说不清，还可以去调查，这事怎么办？去找那个洋鬼子外交官调查？你就背一辈子黑锅吧！”

“那些洋鬼子上课，什么话都敢说，什么问题都问。也不能像如来佛教的，老是讲‘无可奉告’吧？你到底是个老师，不是外交官哪！可你一回答，说不定哪句话就出错儿。他们中文水平又不高，你没说错，他还兴许听错呢！还有，他们胡说，你也得立刻表态。比方说他讲了‘伟大的旗手’什么不中听的话，你就得马上说：‘你这样议论我们党的领导人，极不严肃，我向你提出严重抗议！’你听得麻木了，再不，觉得他的话无伤大雅，不便抗议，说不定他就会在一篇谈中国印象的文章里说‘中国的知识界对毛夫人显然持一种默默的反抗态度。我在谈及她的一些劣迹时，我的汉语老师仅淡淡一笑’，那你可就惨啦！我还有老婆孩子呢！”

“记者更讨厌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他们可是专门写文章在报上发表的！教员整天在那里哇啦哇啦地说，言多语失，谁知道哪一天他在报上给你捅出一条儿来？何况他问你的都是些要命的问题。还是那句话：上课都是一个学生，总共两个人在场，出了什么事，你休

想说得清！”

他的这一番话讲得我呆愣了好半天。我也有老婆孩子！

他是真害怕，不是吓唬我。一个星期后，他果然逃之夭夭，临走时还使劲攥攥我的手，那意思是：“好自为之吧！”

几乎同时，教研室分派给我第一个学生。我成了“过河的小卒”，再没有退路了。

那学生恰恰是个记者，而且是个“小修”记者！

“如来佛”似乎对这安排抱有歉意。他向我解释说：“你刚接触这种工作，按说应该给你一个容易教的……”

接下来，他压低声音说：“本来我给你安排了一位西德汉学家，可是老S很不乐意教‘小修’记者，要求我调换一下，我也不便说什么。好在你也不会只教一个学生，以后教各种类型学生的机会都有。”

我后来才知道“如来佛”的苦衷。原来他是个非党员，正积极要求入党，老S却是支部的组织委员。老S倒也不是怕教记者，而是因为西德人喜欢请客送礼，他这毛病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

我硬着头皮，走马上任了。

事情倒也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可怕。绝大部分学生是想利用难得的机会好好学学中文，不愿浪费有限的课堂时间。企图从教员那里摸一点儿情况的不乏其人；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政治、思想观点的更多。但前者当中的许多人很快就发现，教员身上实在没多少油水，很令人泄气的；后者则多半会遭到迎头痛击，不得不收敛。

我天性好辩，当时的思想又“左”得可以，争论是不可避免的。由于我是“科班出身”（“如来佛”语），教研室分派给我的学生都是中文程度较高的，上课基本上不使用“媒介语”。这就使得我在争论中占有一个明显的优势：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再高，也高

不过我去。我能把自己的道理说得淋漓尽致，他们说到难处，就只能结结巴巴了。我的第二个优势是：我是老师，他们是学生。“师道尊严”在我们这里早被“砸个稀巴烂”了，但红卫兵还没砸到外国去，所以他们只好继续尊敬老师。有时争得我恼了，圆脸拉成长脸，学生自然偃旗息鼓，甘拜下风。这不免有那么点儿以势压人，我教中国学生时，从不干这种事。但外国人就是外国人，我软下来会犯“立场错误”，这就叫“圣人不得已而为之”吧！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不敢稍有松懈。我忘不了我还有老婆孩子。我得承认，在私心的驱使下，我在一些好心的外国朋友面前也说了些违心的话，例如，说红卫兵运动是对的，说北京的城墙应该拆。我可以在家里、在知心朋友面前就这些事发牢骚，讲怪话，但外国人攻击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就必须反驳。

W学院恢复时，筹备小组的一位教授动员我回去，让我负责组建汉语教研室。我历来怕当头头儿，担心从此无法脱身。此外，在使馆教书，每天给5毛钱的“市内出差伙食补贴”。一个月区区15元，却等于多出27%的工资。当时我两个孩子还小，开支较大，每逢月末都累病的妻子红着脸向医务室同事开口借钱，好交上奶费。所以我只好蹬着笨重的“红双喜”，继续在无尽无休的路上挥汗，直到1981年11月。

屈指算算，我的“洋教头”生涯竟持续了将近九年！

老罗和我

——“洋教头”手记之二

我充满疑虑，以一种“深入虎穴”的心情走向B国大使馆。我的第一个洋弟子，姓罗勃曼的“小修”记者就住在那里。站在门外的中国士兵见我走向大门，步伐敏捷地奔上来拦住我。我把证件递给他，他看了好久，还两次抬起头来端详我。证件上的照片是新拍的，跟我本人不该有太大的出入。他总算面无表情地把证件还给

我，让出路来。我推着自行车往里走。

那位记者住在大使馆深处，一座被一群高高的大叶杨包围着的小白楼里。他迎出来，伸给我一只又厚又阔的手：“老师好！我叫霍扬·罗勃曼……”

这是个满头棕发，年纪介乎中、老年之间的大汉，大脑袋、宽肩膀，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国式衣服。他的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充满温和的笑意，里边既找不到可能正闪现在我眼睛里的狐疑，也没有初次见面时通常会有的好奇。仿佛我是他的老相识，经常出入他家。

在他的大写字台前坐下来之后，一位中国女佣端来两杯茶。她衣着整洁，面容端庄，看样子也不像是那种会打小报告，说“情况极不正常”的人。

这一次没正式上课，只是闲谈。谈的都是个人简历和中国古代文化之类，不带丝毫政治色彩。他虽戴着副近视镜，却没什么知识分子气质。“文革”前我看过不少他们国家的电影，如果在那里头给他派个角色，也许一个老工人最适合他。

50年代初他就以记者身份来过中国，并且一住就是好几年。他怀念着北京后门大街一条胡同里的那个四合院，还有那个院子里跟他一起包饺子吃的北京人。眼下，关在大使馆院子里似乎让他感到寂寞，进进出出，都是自己同胞的面孔，“这些人，我不用跑出来这么远，也看得到啊！”大约为弥补这种缺憾，他竭力把自己的房间弄得中国气味浓些：花梨木桌椅，中国老式的红木书橱、茶几，还有摆在玻璃柜里两个据说是五代时期的陶俑，以及挂在墙上两幅其实是复制的明代山水画。他专门邀我近前去观赏，还小心翼翼地拿出陶俑，捧给我看。他那种醉心于自己珍藏的神气，说真的，比那些精心仿制的古董本身更令我动心。

他穿着一条蓝色长裤，大脚上是双“懒汉鞋”，最精彩的还是那件肥大、带万字图案的紫缎褂子。我到底沾过旧社会的边儿，从花

纹、款式和质地判断，很怀疑那件褂子的真正用途。那位老记者忽略了我暗中观察的目光，唯恐我没注意他那件漂亮衣服，挺挺胸，撩起衣襟问我：“这件衣服怎么样？”接着兴冲冲告诉我，这是50年代初，好不容易才从天桥一家估衣铺里寻摸到的。我点着头说：“真好！”

这并非仅仅出于礼貌。即如他那全套的行头，配上棕色头发、白皮肤和一个很大的鼻子，难免令人生出一种滑稽的感觉。但是那滑稽之中蕴含着对中国文化倾慕的真情，它的动人处足以使一切“用途”之类退居次要地位，显得微不足道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平日根本舍不得穿这件衣服，那天是专为和中国老师见面才穿上的。

第一次见面，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对外事教学的恐惧感。至少，罗勃曼同我脑海里勾勒出的精明、刁钻的记者形象没有对上号。

在开始接触他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对怎么称呼他感到十分为难。我头一次叫他“罗勃曼先生”，他显得有几分不自在。我猜想他是习惯了旧称呼——怎么上回在中国是亲切的“同志”，这回就变成了“先生”？我注意到，他接连好几次在提到别人的讲话时，搁进去对他的称呼，例如：“罗勃曼同志，中午在我家吃饺子吧！”“你的力气可真不小哇，罗勃曼同志！”这很像在提示我。

但当时无论在报上还是在交往中的各种场合，对他们都不称“同志”。我很担心这么称呼他，会犯“立场错误”。想来想去没办法，我索性回避称呼。这当然很别扭，罗勃曼也不可能没有觉察。一天，我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课时变动的事。听到他应了一声“哈喽”，我先是怔住，接着福至心灵，来了一句：“是老罗吗？”

他立刻高兴地叫：“噢，是孙老师，我是老罗！我是老罗！”

我好像看见他手握话筒，眉飞色舞的样子。他的姓，是“罗勃